

當時銅器正流行—— 院藏〈仲駒父獸面紋甗〉的製作脈絡

■ 吳曉筠

上古時代的青銅器在宋代成爲知識分子及朝廷追求的對象，是古代聖王的見證，也是當朝禮器的範本。但在民間，上古青銅器成爲人們源源不絕的創意來源，發展出偏離卻有活力的樣貌。晚明至清初雖仍延續南宋以來的玩古風氣，但對古代銅器的審美、品鑑及利用方式皆不盡相同。若是生活在晚明鑑賞標準下的人們遇見了一件南宋的仿古銅器，他們會怎麼做？

國立故宮博物院有一件從未展出、也未被討論過的文物，同時展現了南宋及明代民間新潮仿古銅器的製作與鑑賞。（圖1）這件器物是甗的形式。甗是一種悠久的炊器，在新石器時代以陶土製作，相當盛行。上部是像盆子的甑，底部有鏤孔；下部是帶有三個圓形袋足的鬲。使用時，裝盛食物的甑放在鬲的上面，兩者加在一起，稱之爲甗。在鬲的袋足裡面加水，底部以火加熱，產生的水蒸氣通過甑底部的鏤孔，蒸煮甑內的食物，作用就像是現代的蒸籠。除了分體的形式，也有將甑和鬲做成連體的樣子。爲了方便注水，便需要將甑的鏤孔底部改爲活動式的鏤孔隔板，又稱爲箆子。青銅時代以青銅合金鑄造食器、酒器及炊器，甗也在其中。不論分體式或合體式都很常見。一些連體式甗內壁中段有突出的小簪齒可供放置箆子；一些則是在內壁相應位置做出半環，讓箆子直接掛在環上方方便開闔。青銅甗一如其他青銅器類，外部施以浮雕紋飾，內部以銘文爲記，用於祭祀場合，彰顯家族榮耀，成爲禮器的重要部分。（圖2）

院藏這件銅甗是連體式，全器通高60公分，是中偏大型甗。形式上既符合上古時期甗的形式，又有明顯不同。上面的甑部爲敞口，口沿內側立有雙耳，是晚商到西周的標準樣式。但外部中段有一道微微凹陷的寬帶，中間是排列整齊的細小雷紋，線條呆板，與上古時期的雷紋有別。由一件甗的甑部及鬲部比例看，甑部明顯較短。直筒的腹部直接與鬲部連結，也與商周時期銅甗的甑部及鬲部交接處收束的形態不同。下面的鬲部與上古時期甗的鬲部更加不同。三個袋足外側做成有稜角的三折狀，袋足上部鼓起的部位各有一個細線勾勒的牛首形獸面紋。扁平及線描的平面化、圖樣化特徵與上古時期富有立體感的獸面紋有明顯差異。獸面旁邊細密的圓形螺旋地紋，雲紋邊框，以及接近甑與鬲交界處的一道窄紋飾帶上像是花朵的變形雲紋，也十分不同。可以確定這件器物是時代較晚的作品。

從器物的內部看，予人鑄造粗糙的第一印象。首先，這件甗沒有分隔甑和鬲的鏤孔隔板。從內壁可以看出這件器物是拼接而成的，



圖1 仲駒父獸面紋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1545



圖2-1 西周早期 寡史婦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072



圖2-2 西周早期 鬲史斝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072



圖3 院藏〈仲駒父獸面紋甗〉器內底及器足接縫

器底的拼接痕跡尤其明顯。鬲部帶有紋飾的器腹及三折狀的器足是一體，器底及足的內側則是另外拼接上去的部件，在接縫處可以清楚看見粗疏的焊接痕跡和漏孔。（圖3）從這些特徵看，這件器物不具有實用功能，而是一件收藏

品或是擺飾品。甗部內壁有宋代以後圖錄、銘文輯錄中經常可見的「仲駒父」銘文。

或許是因為這些較晚的特徵及製作上的瑕疵，這件銅甗一直未受重視。但隨著1996年四川彭州南宋青銅器窖藏的發現，近年詳細資料的公布，以及學界對宋代以後仿古青銅器的重視，讓我們可以重新評估這件院藏銅器的價值。

四川彭州銅器窖藏：南宋民間銅器的設計案例

南宋末年生活於四川的富裕人家為躲避發生在當地的宋蒙戰爭（1227-1279），將家中的珍貴物品掩埋起來。目前已在四川發現二十多處青銅器窖藏。在彭州發現的一處青銅器窖藏的物品特別多，包括七十餘件銅器、一件瓷器及二件石硯。發掘者將數量頗豐的銅器分為生



圖4 四川彭州南宋銅器窖藏出土仿古銅器 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頁218、248。
 圖4-1（左）南宋 四川彭州銅器窖藏出土 銅尊 局部
 圖4-2（右）南宋 四川彭州銅器窖藏出土 銅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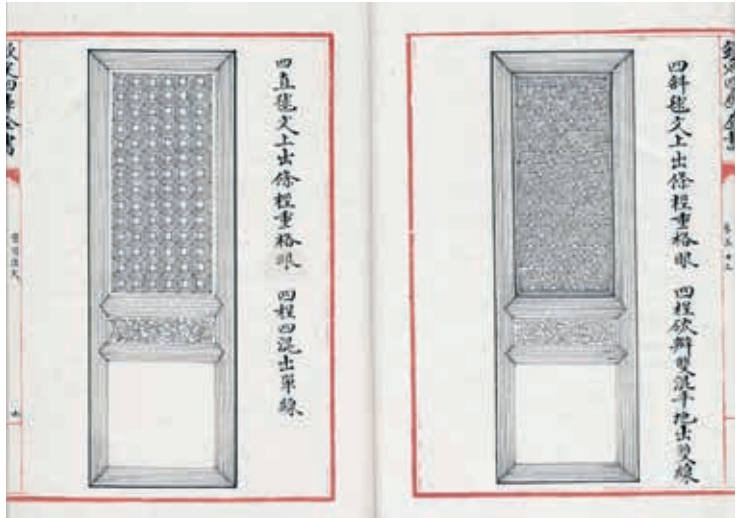


圖5 四川彭州南宋窖藏出土銅甗及《營造法式》中的毳紋裝飾
 圖5-1（左）南宋 四川彭州銅器窖藏出土 銅甗 取自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館，《彭州宋代青銅器窖藏》，頁62。
 圖5-2（右）宋 李誠 《營造法式》 門窗格子門等第一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4575

活用具及佛教造像兩大類。其中，具有北宋以來追仿上古青銅器特色的器物，格外吸引學者的目光。韓巍注意到窖藏出土的一件半截銅尊，器形及紋飾都與宋徽宗朝（1110-1126）禮器〈宣

和山尊〉十分相近，有可能是以〈宣和山尊〉為母本來製作的複製品。（圖4-1）除了模仿當朝仿古禮器，禮制之外的創新仿古銅器更具特色。一件銅琮模仿新石器時代玉琮的形制，每



圖6 南宋 四川彭州銅器窖藏出土 銅甗 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頁203、205。

一面的中間以龍紋為飾，其他部分則填以模仿青銅器紋飾的地紋。（圖4-2）更多的是將上古與當代青銅器器形、紋飾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如陳雲倩所指出的，彭州一件銅甗上，除了可以見到模仿自北宋《宣和博古圖》等銅器圖錄的紋飾外，也可見到當時建築所用格子門格眼上的毯紋裝飾。（圖5）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於2006年舉辦之「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特展所歸納的，這種仿古青銅器雖以上古青銅器為本，又具有極高的開放性、隨意性，是官方傳統與民間審美的結合，是富有當代創造力的新奇作品。

彭州青銅器窖藏中最能展現這種具有開放性的仿古銅器是一件分體式的銅甗，全器高76.7公分，是窖藏中體積最大的器物。（圖6）甗部

為直筒狀，底部收小可套入鬲部的器口。直口、方唇，器外壁兩側有方形附耳，耳外側為南宋至元代流行的波濤紋。器外壁有層層的繁複紋飾帶，口沿下飾一圈花形雲紋，腹部四層紋飾以絞索紋為界，由上至下依序為方形雷紋、螺旋乳丁紋、波濤紋及變形夔紋紋飾帶。仿古意象突出的螺旋乳丁紋及變形夔紋紋飾帶具有上古意象，上、下緣是具當代特色的雲紋邊框，並以時興的毯紋襯地。許雅惠分析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銅壺紋飾，指出宋代流行的波濤紋與《宣和博古圖》著錄的漢代銅器〈漢山龍紋壺〉上的紋飾有關。（圖7）與〈漢山龍紋壺〉相比，彭州甗上的波濤紋去除了〈漢山龍紋壺〉波濤紋上原有的動物紋及分隔線，並進一步將帶有浪花



圖7 《宣和博古圖》〈漢山龍紋壺〉及宋代模仿的銅壺
圖7-1 (左) 宋 王黼 《宣和博古圖》卷13 漢山龍紋壺 元至大間刊明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4561
圖7-2 (右) 宋~元 銅壺 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引自Kerr, Rose. *Later Chinese Bronzes*.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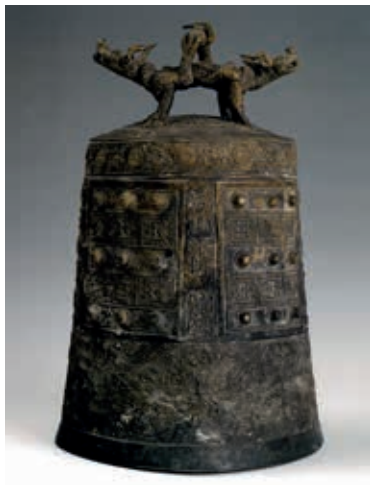


圖8 帶有仿古紋飾的南宋器物
圖8-1 (左) 南宋 江西德安蒲亭北門青銅器窖藏出土 銅長頸瓶 取自浙江省博物館編,《中興紀勝:南宋風物觀止》,頁86。
圖8-2 (中) 南宋 浙江杭州西湖出水 銅鐘 取自浙江省博物館編,《中興紀勝:南宋風物觀止》,頁80。
圖8-3 (右) 南宋 四川彭州金銀器窖藏出土 銀杯 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頁120。



圖9 南宋~元 獸面紋環耳銅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1465



圖10 元 八卦貫耳銅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0468

的波濤紋規律化，呈現出比仿古紋飾更突出的時代意象。鬲部為直口、短頸，肩部有三個雲形提耳。三個器足為三折片狀，外表看起來與前述院藏仿古銅甌的鬲足外側一致。頸部是繁複又規律的波曲雲紋。鬲足上部細線勾勒的牛首形獸面，圓形螺旋紋地紋，均與院藏器極接近。牛角獸面紋飾區塊的邊框則較院藏器複雜，在雲紋內側另有層層的弧線紋。

陳芳妹、韓巍等學者已仔細分析宋代仿古禮器及彭州窖藏銅器的功能及關連性。北宋朝廷嚴格按照上古青銅器製作仿古禮器，南宋朝廷延續北宋禮器樣式，繼續製作仿古禮器。彭州窖藏青銅器雖也有模仿當朝禮器的器物，但銅甌等銅器

仿古與新創並陳，整體視覺印象新穎，與朝廷制定的仿古禮器十分不同。一些當時流行的紋飾，也可見於院藏及其他地方出土的銅器。例如圓形螺旋紋、波濤紋等都可見於浙江、江西出土的南宋青銅器，也見於其他材質的器物。（圖8）院藏南宋~元〈獸面紋環耳壺〉頸部為凸線勾勒之獸面紋，圈足上為波濤紋，也是類似概念下的作品。（圖9）另一件院藏元代〈八卦貫耳銅壺〉，頸部是波濤紋，洶湧翻騰、奔流迴旋的水流動態感十足。兩側貫耳及中間紋飾帶上有如藤蔓般的細密卷雲紋，腹部為配有卷葉、龜背紋地的八卦紋，圈足上以方格襯地的龍紋（圖10），都是當時流行的經典紋飾。



圖11 南宋 四川彭州南宋銅器窖藏出土 組合式三足銅壺
引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頁210。



圖12 四川彭州甗與院藏甗甗部紋飾比較

圖12-1 (左) 南宋 四川彭州南宋青銅器窖藏出土 銅甗 局部 引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頁204。

圖12-2 (右) 仲駒父獸面紋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1545

極盡裝飾的彭州銅甗有著南宋銅器的時髦外表，但本身卻不是一件實用器。由器口往內看，是一件沒有底的器物。另一些彭州窖藏銅器則是由多部件組成，例如一些銅瓶及銅壺是由上下兩截組裝，實際上無法裝盛、傾倒液體，說明這些器物都是擺設品。（圖 11）

將院藏銅甗與彭州銅甗對比，甗部的牛首形獸面及圓圈雷紋構圖非常接近。表現手法上，院藏銅甗帶有些微浮雕，彭州銅甗是完全平面

的線描圖樣。甗、鬲銜接處的花形雲紋則與彭州甗甗部口沿下及一件三足銅壺頸部的花形雲紋完全一致。（圖 6、11、12）器形上，兩者甗部的量體相當，去掉院藏甗的甗部及器底後，短頸、無底、三折片狀器足都與彭州甗的鬲部一致。這些相似性說明院藏甗的鬲部很可能與彭州窖藏銅器使用相同範本的作坊。也可依據彭州甗的甗部推想院藏甗的鬲部在南宋時應有的分體原貌。

「仲駒父作」：宋代以後形成的名品

南宋收藏古銅器以及製作仿古器的風氣，為明代文人所承繼，並更加興盛，發展出多元脈絡。宋代的《考古圖》、《宣和博古圖》更成為收藏鑑賞指南以及製作仿古銅器的範本。

明代晚期士人張應文（約 1524-1585）繼承了父親的龐大收藏，對收藏鑑賞書畫、器物頗有心得，並將當時的收藏知識總結於《清秘藏》一書中。書中提到了一種當時流行於市肆的屑湊銅器：「屑湊，謂搜索古冢舊器不完者，或取其耳，或取其足，或取其鑿，或取其腹，或取古壺蓋，做圓鼎腹。或取舊鏡面，做方片，湊方鼎身。亦用鉛冷釘湊合成器，法臘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做出土狀。」屑湊銅器是將破損殘缺的出土古代銅器改裝拼湊起來，按照當時的古銅器知識將多件器物以新的技術拼湊填補成一件，或是以之為材料，推理想像發明出新的造型。在晚明市場對古銅器的大量

需求下，這種銅器的製作大為盛行。將不成器的古物拼湊成完整器物，一方面可提高古物的價格，另一方面在形態及紋飾上也能比贗品更接近古代作品，真假難辨。張應文對屑湊銅器的描述來自於稍早的明代高濂（1573-1620）《遵生八箋》。在〈燕閑清賞箋〉「新鑄偽造」中，高濂將屑湊銅器稱為「改鑄」。在他看來，殘缺的三代秦漢器物是真品，但屑湊銅器即便製作得再好，仍不是真正的古物。

院藏〈仲駒父獸面紋甗〉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製作的一件屑湊銅器。當一件南宋分體式甗的鬲部再次出現在世人眼前，一件缺乏甗的上半部，也沒有底部，貌似殘件的器物，應該以什麼方式讓它「成器」？院藏銅甗的甗部為敞口、環形立耳站在口沿內側等特徵，都很接近上古時期銅甗的器形。但器外壁微微凹下的細密雷紋寬帶，與上古銅甗習見的獸面紋紋飾帶、弦紋，或雲雷紋紋飾帶不同。在器身中段隱約可以看見被重建的甗與南宋鬲部的交界。（圖 12-2）這一重建並未按照上古時期連體式甗應有的樣式，即甗的底部先收束再銜接到鬲部，而是直接順著南宋鬲部口沿的尺寸延伸上來，導致器形看起來不太自然。沒有底部的南宋銅鬲則以粗糙的方式，模擬上古銅鬲的袋足底部，改成封閉式的器底及器足。院藏銅甗甗部與鬲部的接合處相當穩固，並加以修飾，刻意不讓人看出拼接的痕跡。但鬲部附加的底部製作粗疏，也不完全密接，或許說明兩者並不是在同一時間拼接上去，而是經過多次加工。時間點可能在明晚期或清代，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為了增加這件作品的價值，在重建起來的甗部內壁加上了 18 字銘文：「录旁仲駒父作仲姜毀（簋），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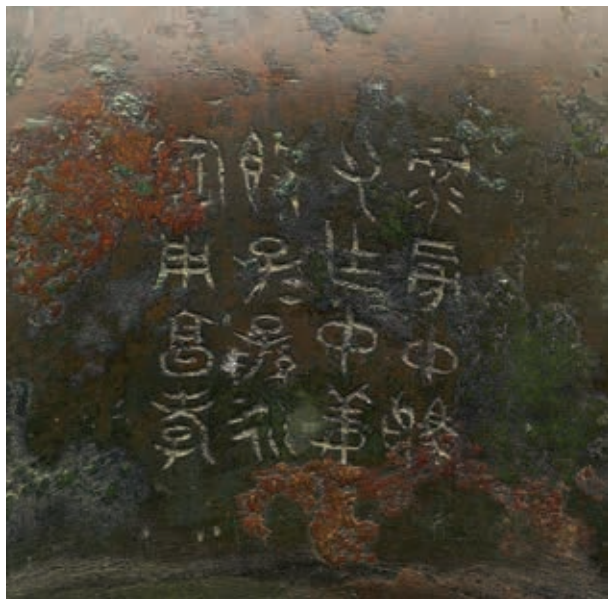


圖13 仲駒父獸面紋甗 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1545



圖14 宋 王黼 《宣和博古圖》卷16 周仲駒父敦一 元至大間刊明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4564



圖15 《宣和博古圖》〈周師望敦〉及明〈太師望簋〉器形與銘文比較

圖15-1 (上) 宋 王黼 《宣和博古圖》 周師望敦 元至大間刊明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4565

圖15-2 (下) 明 太師望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0151

這段銘文最早見載於北宋《宣和博古圖》，但銘文所述的器物為簋，與甗完全不同。（圖 14）張臨生曾考釋這篇銘文的西周史實，並進一步追索此銘在宋代以後的著錄及仿作情況。他提出此銘文句簡單、長短適中，在《宣和博古圖》著錄三件，也載於南宋薛尚功（生卒年不詳）《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及王球（生卒年不詳）《嘯堂集古錄》等明清時期流傳廣泛的銘文輯錄，使之受到偽古者的青睞。如他所指出的，不但張應文見過仲駒父簋，在清乾隆皇帝（1736-1795 在位）敕編的《西清古鑑》等四本青銅器圖譜中，帶有仲駒父簋銘文的器物多達二十一件，除了簋之外更見於甗、壺、尊、觥、盤、卣等，十分氾濫。與仲駒父簋情況相近者，還有文王方鼎、太師望簋等等，都是同一情境下因宋代著錄及明清時期仿作大量流通而成名。（圖 15）

結語

宋代文人及朝廷追索三代禮器的大背景下，帶動了對古代銅器的學習、收藏與模仿。相較於朝廷嚴肅的態度，地方上發展出異趣橫生的創新。院藏〈仲駒父獸面紋甗〉的鬲部即展現了南宋民間的創新風格。與之相對的，甗部則反映了明清時期有別於南宋朝廷及民間看待古代青銅器的方式。當一件帶有創新風格的南宋分體甗的鬲部在幾百年後以古銅器之姿出現時，被認為是一件殘器，並依據上古銅甗的形制重塑成連體式甗。兩個時代、兩種品味並呈於一器，疊加出仿古銅器在歷史發展中的多元面貌。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青綠：清代乾隆朝古代及仿古銅器作色及修繕考察」（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136-001-MY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參考書目：

1.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 中華書局編，《宋人著錄金文叢刊》（初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3. 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館，〈彭州宋代青銅器窖藏〉，《文物》，2009年1期，頁54-70。
 4. 浙江省博物館編，《中興紀勝：南宋風物觀止》，北京：中國書店，2015。
 5. 張臨生，〈文王方鼎與仲駒父簋〉，《故宮學術季刊》，15卷1期，1997年秋季號，頁1-44。
 6. 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1年9月，頁1-60。
 7. 許雅惠，〈晚明的古銅知識與仿古銅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264-275。
 8. 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人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93-138。
 9. 謝濤，〈彭州宋代窖藏出土的仿古青銅器〉，《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82-287。
 10. 韓巍，〈宋代仿古製作的“樣本”問題〉，《宋韻：四川窖藏文物集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88-296。
 11. Kerr, Rose. *Later Chinese Bronze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90.
 12. Sena, Yun-Chiahn C. (陳雲倩) “Archaistic Objects in Southern Song Tombs and Caches.”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8期，2015年3月，頁51-118。
-